



“乡愁是一张小小的船票……”余光中的诗唤起了人们心底最柔软之处。可谁说，校友对母校老建筑的情怀不是乡愁？然而，这部分“乡愁”却多面临着留或去的选择。

留或去，那一缕情系建筑的校园乡愁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

了。”卢永毅补充说。

那么，又是什么驱动了高校对历史建筑的拆建工作呢？

认识不到位

“最大的问题在于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不足。”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汤羽扬和卢永毅异口同声地说道。

卢永毅指出，总有一些人认为，只有改造建设、破旧立新，才是发展的根本方式。“其中的误区是一种观点认为年代不那么久远的建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校园谈不上是建筑遗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规模小、没有隆重形式的建筑或构筑物就没有价值，长期缺乏维护，设施欠缺的旧建筑就应该拆除。”

甚至还有人宣称，高校校园内的建设长期以来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可以在地方政府管理或社会意见之外独立行事等，这些认识很容易造成对一些校园历史建筑的破坏。

“能够反映学校办学历史、特色的建筑肯定应该保留下来。”对此，汤羽扬坚定不移，“拆除历史建筑的主要原因还是对其价值认识不到位。”

她进一步指出，对高校中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工作，技术手段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旧建筑的延续使用，甚至对老建筑材料的再利用自古便有。“关键在于价值观的分歧，注重学校文化传承与延续的人士更加重视校园历史建筑及历史空间环境的价值。”

“这就可能造成为了校园建设发展作出不恰当的拆除决策，或以低水平方式实施保护修缮工程，造成建设性破坏。”卢永毅补充道。

事实上，缺少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也反映了国民的基本心态。从中国很多有关新旧的词

汇如“吐故纳新”“辞旧迎新”中都可以窥见。

而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国际上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其实从未降温。记者了解到，1913年，法国《历史古迹法》就得以通过实施。目前，法国大约有4万处历史古迹受到保护。其中约一半为私有财产，它们可以享受国家15%~50%的修缮费资助。

为了更好地保护京都的古城风貌，日本制定了《古都保护法》。京都大学有一个学校规划建设委员会，制定修改学校校园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理念、基本原则，综合平衡各方意见，处理好拆建问题。

其他的矛盾

除了认识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成为高校保护历史建筑的桎梏？

不久前，汤羽扬参与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的保护工作。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是1919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莫菲设计，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完成的扩建设计。

其建筑的布局、质量、形式很好，沿用至今。

然而，100年前建造的建筑是无法满足现行抗震规范标准的，同样不能完全满足现行消防规范。学校多次组织各方专家共同讨论，最终考虑到增加隔振垫的方式对文物建筑原基础扰动过大，始终没有通过该结构加固方案。最后与消防局进行充分沟通后，原则上同意了在不降低现有消防标准的情况下，进行文物的维修，保证更多的保存建筑的历史信息。

清华图书馆老馆的保护修缮工作就像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高校历史建筑保护的一大矛盾。“多数高校的历史建筑还在使用中，而不仅仅作为展品。这些历史建筑包括图书馆、礼堂、教学楼、宿舍楼等，类型众多，保护与使用的关

系需要平衡。”汤羽扬指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历史建筑很难满足现代建筑的抗震规范，这需要有一个适宜的规范标准。犹如不能让一位80岁的老人和20岁的小伙扛一样重的麻袋一样。”

此外，在卢永毅看来，中国高校特有的矛盾还在于“一方面，众多高校都会面临学校发展、扩招等带来的缺乏空间的压力，造成对历史建筑不恰当的改建、加建甚至拆除重建；另一方面，一些高校有一批历史建筑功能设施落后，或长期缺乏维护，而学校缺乏专项资金修缮改善”。

“各方面都希望有法规、政策，相应的标准，才能使得历史建筑更好地保护下去。”汤羽扬语重心长地说。

该如何保护

汤羽扬在高校里作教育评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学校搬了新校区，很多校友还是更愿意回老校区。“他们在老校区受教育，对那里的建筑、环境更有情感。把优秀的校园建筑保护下来应该提倡，因为这也是乡愁的一部分。乡愁不一定是老家，在大学受高等教育，是走向社会的重要起点，会令学子十分怀念”。

在她看来，高校建筑保护的第一步工作是认定——对历史建筑的价值进行研究、评估，充分认识它的价值，然后去保护能够反映其价值的历史信息。这其中需要多方参加研究，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应交给遗产保护的管理部门。

对于高校建筑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这样的活动，卢永毅、汤羽扬表示十分支持。因为这不仅扩展了建筑遗产在全社会的认识视野，也推动建立一种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更整体的价值认识。

卢永毅指出，对于每所有历史的高校，校园建设史、校园历史建筑研究应该成为校史建设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形成关于校园建成环境的历史特征认识以及价值共识。“这种认识应该是历史性、整体性的，包括历史建筑、历史构筑物以及校园空间格局和景观环境，而不是碎片的或仅仅依据是否有文物身份来判断。高校需要利用遗产保护专家的专业力量，为自己的历史校园做一个有远见的、高水平的保护规划”。

同时，高校建筑的保护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卢永毅看来，从武汉大学工学部大楼的被拆事件中，可以吸取到这样的经验——没有文物身份的建筑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建筑的去留应该慎重，应该组织专家和社会展开相关价值的讨论，作出理性决策。

除此之外，高校建筑或建成环境的遗产是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源，发挥社会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卢永毅表示，特别要依靠地方政府保护管理部门，以及优秀的历史保护专家和保护修复实践者。“地方政府要依法管理和积极推动校园建筑遗产的保护，并从城市宏观环境的规划建设中支持和指导校园的历史保护和发展。”

中国大学评论

据媒体报道，近日，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杨森在年级会上宣读了2014级英语专业所有通过今年6月专业四级考试学生的成绩，在243名学生中，有35人不及格。不少学生认为，杨森的做法欠妥，不够尊重学生的隐私。随后，在某个学生QQ群里，一些同学匿名对杨森的做法进行了“声讨”，有人甚至用了脏话。杨森知道后，在另一个QQ群向学生喊话，也用了一些不文明的词语回骂。

对于这件事，校方、当事辅导员、学生以及社会舆论各有各的说法。校方称，学院对怎样公布专业四级成绩没有明文规定；辅导员称，以前是学院通过张榜公布，这给不及格学生的心灵压力更大，因此改成在年级会上公布；而学生则反对，自己高中时代也没有遭遇这种成绩被当众公布的经历。而社会舆论赞成当众公布和反对当众公布的都有，赞成当众公布的认为学生太矫情，连成绩公开也受不了；反对当众公布者则认为，成绩是学生的隐私，不要说大学生，就是小学生成绩也不得公开。在全国一些省市，已经对不公开公布学生成绩有了明文规定，目前高考也不再公开公布学生的成绩。

关于成绩是学生隐私的观念，笔者不再赘述。事实上，在这起“对骂”事件中，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为何不借鉴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四级考试发布成绩的方法？由学生自己通过网站系统查询，而不需要从学校处获知。目前的成绩公布方式并没有把这一考试评价作为社会专业评价考试对待，还将其作为教育部门主导的行政性质极强的考试对待。

有一些评论在分析这起事件时，对辅导员在年级会上公布学生成绩颇为不解。他们以为，学生是可以通过网站查到自己的成绩的，既然可以查到成绩，学校再公布的话，就明显侵犯学生的权利。但事实上，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和英语四、六级考试不同，是针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考试，也是对英语专业教学质量进行的评估，考试成绩还分合格和不及格，考试成绩不能在网站上查询，而需要学生自己到学校教务部门去查。也就是说，考试成绩是由考试组织方给校方的，再由校方给学生。

这不是社会化考试的做法。

社会化考试应该由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考试成绩给学生自己。我国外语四、六级考试就根据社会化考试的要求调整了以前过于行政化的方法，包括明确规定不能将成绩与学生毕业挂钩、考试不再分合格还是不合格，学生可直接在网站上查询自己的成绩等。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考试评价与学校的关系，有利于扭转学校对考试的功利态度。由于学生可以自己查询成绩，校方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再公布成绩。我国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把成绩给学生自己，而不是学生到学校去看成绩。

在笔者看来，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实行社会化考试。现行的将考试成绩给校方，而不是由学生自己查询的做法，其实质是将考试转变为学校行为。而且由于这涉及到对学校英语专业教学质量的评估，学校就十分看重合格率和优秀率，由此会要求学校老师围绕考试教学，追求合格率和优秀率。

对英语专业教学质量当然需要评估。然而，这种评估不应该是简单的考试评估，更不能是行政主导的考试评估，而应该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

在加拿大，每个中学生在毕业时，都要通过规定科目的省考。省考成绩会影响到学生能否毕业，以及申请大学的成败。但即使是这样，参加省考也是学生自己的事，省考成绩也是由学生自己在网站上查询。学生在毕业时，学校的成绩和省考成绩会汇总在一起，但只有每个学生自己知道，学校从不会公开省考成绩，甚至该科目的任课老师都可能不知道具体学生的省考成绩。因为学生不会告诉老师，学校通常也不会把学生的具体省考成绩告诉老师。教育部门和学校会对省考成绩进行分析，但很多老师根本不在乎省考成绩，而会按自己对教学的理解，进行自主教学。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政府教育部门要把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学校、尊重学校自主办学，同时退出行政评价，推进社会评价与专业评价。今后，除了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教学考核外，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价都应该是社会专业评价，必须按照社会化专业评价方式推进，不能再通过行政力量推进。英语专业考试可以继续保留，但要进行社会化考试改革。

熊丙奇

130年来首现被迫辞职校长

不久前，因“不当录取总统亲信子女”，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长崔庆嬉宣布辞职，她也成为了这所大学成立130年来，首位没能完成任期被迫辞职的“不光彩校长”。

简单地说，崔庆嬉的辞职源于“招生丑闻”。而此类新闻在国内高校其实并不鲜见，因此而丢官罢职，甚至锒铛入狱者也不在少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内，违法违纪者一般是因为自上而下的调查而东窗事发，但此次韩国大学校长的辞职，直接原因却是得知消息的学生持续两个多月的抗议。

设想一下，如果这件事出现在中国，我们的学生会如此“眼里揉不进沙子”吗？

就在不久前，国内媒体爆出了另一则新闻——某高校在国庆期间强制学生捐款，这件事因为有学生在网上抱怨而被媒体发现，最终被公之于众。这两则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学校的不当行为并没有涉及到学生切身的实际利益（参加抗议的已经是在校生），但学生们为了维护学校的荣誉而选择直接表达自身观点；后者，学校的行为已经涉及到了学生个人利益，但学生们只是选择在网络上发泄不满，甚至有这样行为者在全体学生中都不是少数。

在此，笔者并不认为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就一定要采取抗议之类的激烈行为，但面对学校的某些不当行为，我们的学生是否缺少一种向学校直接说“不”的勇气呢？

南开大学获校友1亿元捐赠

10月中旬，南开大学获得校友周海冰捐赠的一笔高达1亿元的巨额款项，这也成为了该校建校97年以来的校友捐赠之最。

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这笔创南开校友捐赠纪录的资金，在国内兄弟高校中并不算很突出。比如就在一个月前，电子科技大学收到了一位校友超过10亿元的单笔捐赠。不过，此次获捐也有值得让人惊喜之处，那就是在获得这笔捐款时，南开并非在校庆期间。

这句话多少有些调侃意味。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高校近年来获得社会捐赠的总量在持续增加，但这更多的源自于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这导致高校吸纳捐款基本上都要利用校庆等重大节日。

当然，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高校的获捐高峰也是在校庆期间，但中国高校似乎在这方面要更加明显，而缺乏持续性的制度保证，社会捐赠对高校发展的推动力难免就会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我国高校近年来屡获巨额捐助，但在吸纳社会资金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长沙师范学院要求学生

每学期跑120公里

最近有媒体爆出，长沙师范学院在新学期引进了一款手机运动软件，凭借这款可以打卡的软件，学校要求每名学生每学期完成120公里的跑步里程数。这让很多学生叫苦不迭。

面对大学生体质下降的趋势，通过某些强制手段，要求学生达到一定的运动量，这样的做法

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好的初衷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好的做法。

在我国高校，强制学生运动的做法早已有之。比如，清华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实行了每日午后“强制锻炼”制度。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逼”学生出来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清华在强制学生运动的同时，既有制度上的保证，又有教师人员的安排，更有场地、器械上的服务。总之，在强制学生锻炼的同时，学校本身也要投入大量精力。

反观长沙师范学院的做法，仅仅通过一款手机软件，就想达到让学生“老老实实”跑步的目的，这样的想法似乎有些简单。于是乎，新规一旦出台后，代跑业务便随即而生了。

应该说，这一事件本身其实并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其背后却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高校是否有时会存在一些“懒政”的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克服呢？

175所高校撤销

576个学位点

10月下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下达2016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全国共有25个省份的175所高校大幅撤销576个学位点，包括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是继今年3月，95个学位点被要求“限期整改”后，全国高校学位点的又一次大幅调整。

当一个学位授予点不能达到授予学位的最低要求时，被撤销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说，500多个学位点的撤销是一件大好事。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与学位点撤销关系最为密切的师生利益该如何保证。

去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中规定，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3年内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权。3年

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仍未毕业的研究生由学位授予单位转由本单位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或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学位。这样的制度安排明显是保证了在读学生的利益，此种安排值得点赞，但相对于学生，学位授予点老师们的利益又该如何保证呢？当他们无法再招到学生，他们的出路又何在呢？

超过8成海归归国后“学非所用”

10月中旬，《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海归人员回国就业后，“所学”与“所用”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超半数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的匹配程度一般，仅有15.1%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内容与海外所学完全匹配。

大学生所学专业与未来就业领域存在误差，这样的现象不管发生在“土鳖”还是“海龟”身上，其实都不奇怪。但如调查所显示的比如此之大，似乎有些出乎意料。而在产生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中，海外留学人员缺乏清晰、科学的职业规划是不能不提的。根据调查，在海外留学人员中，拥有清晰职业规划者仅有47.6%。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一调查公布的几乎同时，另一份《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本科篇》在京发布。这本白皮书显示，有接近一成的本科毕业生是“听从父母安排”而出国留学的。更有8%的家长在孩子小学及以前，便有了让孩子在本科出国的想法。

当我们的留学生量是在父母的“挟制”下踏上留学之路时，何谈学生自己的职业规划？

必须承认，虽然中留外流早已普遍，但在很多人眼中，留学依然是一件足以光耀门楣的事情，秉持“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观念的留学参与者，常常处于为了留学而留学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职业规划本身也就可有可无了。但是，仅仅拿到一个国外大学的文凭，是我们留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吗？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园一角